

庆阳的窑洞

□ 杨维军

1940年底，毛泽东对从前线回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们说：“不习惯蹲窑洞，这是要不得的。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延安的窑洞有马列主义，延安的窑洞能指挥全国的抗日斗争。”

窑洞是北方人最古老的居住形式，一般有靠崖式、下沉式、独立式等形制。夏商时期，先民挖窑洞，建村落，凿洞而居，耕耘稼穡，《诗经》称“陶复陶穴”。唐宋时期，窑洞有了功能分工，出现了暗庄、明庄和四合院庄。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多见高大土墙将一组窑洞围起来的堡子。窑洞的数量、形态、种类随着人口增长和时代发展而变化，历史上曾有窑洞住室、庙宇、客店、驿站、学校、商店、仓库等，新中国成立前皮影戏、小型文艺演出等也在窑洞里举行。

有人说，陕北是一个大气场。无论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还是客居这里的异乡人，只要投入这块土地的怀抱，让自己的心灵与这块土地同步震颤，就一定取得巨大的能量。这里的陕北，包含今天陕西的延安、榆林，甘肃的庆阳和宁夏的部分地区。这块地方高天厚土，黄土层厚，有的达几十米，百姓家家住着窑洞。由于独特的山梁、原川、沟壑地貌，其中靠山窑较多。庆阳地区有董志原、早胜原、春荣原、西华池原、屯字原等大原，原上的人住叫地坑院的窑洞。千百年来，这里的人视窑洞为家业。窑洞代表着财富，凝结着人事，沉积了文化。过去，当地人辛劳一生，最基本的愿望就是筑几孔窑洞，把结婚叫“入洞房”，有了娶娶了妻，才算成了家立了业。路遥、陈忠实、姚昌昌等作家，都写过窑洞的故事。

这里的窑洞也孕育了中国革命，传承着红色基因。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里是中国革命的福地、圣地和大本营、战略大后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党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提供了落脚点，为后来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

点，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这里的一排排窑洞，见证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与成熟，曾经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延安的窑洞无疑是最革命的，庆阳的窑洞也与中国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

华池县的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的梢山中，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南梁是最初的陕甘边、后来的陕甘或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和“心脏”，是一块不能被遗忘、轻视的红色热土。20世纪20年代末，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南梁一带宣传马列主义，组建游击队，点燃了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烈火，擎起了工农武装的红色大旗。为把南梁建成巩固的后方，1934年2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小河沟四合台重建，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寨子湾恢复，同时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标志着武装斗争的全面开展及根据地的基本形成。随着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1934年11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南梁荔园堡关帝庙召开，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同时还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开辟与建设，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

这块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陕甘边根据地，就与窑洞直接相关。今天，边区政府旧址、军事委员会驻地旧址也都仅有8孔窑洞。在这些窑洞里，革命先辈领导了西北革命，部署了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从而夺取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正宁县官河镇南500米处有个王录村。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国民党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力主讨伐“叛逆”，企图扩大内战，乘机取代蒋介石。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奉命由三边地区南下，协同东北



军、西北军御敌。行至淳化、耀县、三原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部队返回北上。1937年2月22日，红一军团进驻正宁、宁县一带。代理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参谋长孙毅、政治部主任邓小平等领导人和军团部，分别住在官河镇王录村、北头村的几孔大窑里长达5个月。其中，邓小平住在王德家的2孔窑洞里。在窑洞中，革命先辈组织红军开展军事政训，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8月上旬，红一军团奉命前往三原整编奔赴抗日前线，这里是名副其实的红军抗日的出发点。

在正宁县五顷塬回族乡南邑村东约500米的半山腰上，有1处窑洞庄院。庄院坐西向东，门前是纵横交错的大沟，不远处是苍茫子午岭，群山环抱，梢林密布。庄院里有5孔窑洞，现为习仲勋旧居。南邑是当时关中特区的首府，习仲勋当年在这几孔窑洞里领导了关中特区，创建了新正、新宁、赤水、淳耀、永红等县的红色政权。今天庄院的墙根底，当年习仲勋种的1棵桑树，苍劲挺拔、枝繁叶茂，一派兴盛景象。

合水县蒿咀铺乡张举原村一个小原塬上，有3孔窑洞，这是著名的包家寨会议遗址。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甘边区红

军临时总指挥部在这几孔窑洞里召开联席会议，史称包家寨会议。会议作出了重建红26军、走井冈山道路，以南梁为中心、建立三路游击区的重大决定。包家寨会议是在陕西省委遭破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在窑洞中作出的决定称之为“狡兔三窟”，也与窑洞有关。

诸如以上有故事的窑洞在庆阳很多，它们见证了我们党早期革命的重大斗争、事变、活动，有着辉煌的历史。陕甘革命根据地时期，党政军的指挥所在窑洞，列宁小学、军械所、被服厂、苏区银行等都在窑洞；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都曾在河连湾窑洞庄院办公，抗大七分分校等都建在豹子川的窑洞里，遍布川原、沟梁的窑洞支撑起了战略大后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等都曾在庆阳转战运筹、指点江山，领导全党全国人民一步步打胜仗、夺天下。今天，随着脱贫攻坚取得胜利，窑洞也成为文物，但属于它的荣耀、沉浸其中的记忆和基因永存，为中国革命立下的功勋彪炳史册、在老区人民心中永存。

金井胡同里的清末法学家——走进北京沈家本故居

□ 石 伟

北京菜市口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里是清朝刑场，清朝末年戊戌变法“六君子”就是在菜市口被杀害的。从现代观念看，封建年代的杀人酷刑由于太过残忍，已经不符合现代法制文明的要求。而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酷刑的终止，正是源于距离菜市口向北不远处一个院落的主人——沈家本。

沈家本（1840—1913年），字子淳，号寄谿，浙江湖州人，是我国近代著名法学家、清末修律的代表人物。沈家本历任天津、保定知府，刑部右侍郎、修订法律大臣、大理院正卿、京师法律学堂管理事务大臣、资政院副总裁等职。由于对包括废除酷刑在内的清末修律改革作出的卓越贡献，会通中外的沈家本被誉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奠基人”。

沈家本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金井胡同1号。金井胡同在宣武门外，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从金井胡同向南约一公里，就是著名的菜市口。据说，金井胡同的得名，源于故居院落门前的一口被居民们唤作“金井”的水井。胡同依此取名为金井胡同，并一直沿用至今。1901年，沈家本进京担任刑部右侍郎，购买了吴兴会馆作为住宅后便居住于此，直至1913年病逝。

故居坐北朝南，平面呈矩形，共三进院落，占地面积1703.38平方米，文物建筑面积1014.85平方米，是西城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1月9日，经过修缮后的故居正式重新对外开放。

故居门口外墙上有一方白色石碑，上面题有“沈家本故居”。故居主要建筑建在西部南北中线上。故居大门两侧连接有门房两间和倒座房六间。进入大门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两层中西合璧式砖木小楼，楼上匾额题有三个字“枕碧楼”。枕碧楼是沈家本的藏书楼，当时藏书达到5万余册，他在此会见过许多清末民初的



名人。此楼更是沈家本故居的标志性建筑。经过修缮后，该楼一层陈列了沈家本曾孙沈厚铎捐赠的部分沈家本生前用过的印章、砚台等珍贵文物。二层已被还原成书房的模样，陈列了沈家本的一系列重要著作。

枕碧楼左侧是三间厢房，目前已被改造成纪念沈家本的主堂。主堂连同第二进院、后院有关房屋，全面展示了沈家本的生平、贡献以及沈家本研究的有关情况。少年时期，沈家本随在刑部为官的父亲沈丙莹定居北京，饱读诗书，也较常人较早地接触到律学。在刑部任职期间，他留心案牘，用心于经史考证和律学研究。1883年考中进士后，沈家本因“专心法律之学”，以律鸣于时。沈家本参与清末四大疑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查办，为杨乃武最终洗雪冤情作出重要贡献。

1900年以后，英、日、美、葡等国在中国续订条约时曾表示，如果中国能改良法律，即放弃在华的领事裁判权。1901年1月，清政府发布变法上谕，启动新政。次年5月，为了“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收回领事裁判权，清政府决定改法修律。年已花甲的沈家本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从此开启清末修律的大幕。此时，沈家本已经入住金井胡同。

从1902年2月至1910年12月，近10年中，沈家本主持修订法律馆，搜集、考订、整理中国历代法律，翻译国外法律和法学著作，提出废除酷

刑、改造监狱制度、推行审判独立，积极改造旧律、制定新律、初步构建起现代审判制度，开创了中国现代法律与法学研究新格局。

在此期间，沈家本遍览历代法制典籍、刑狱档案，对中国古代法律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研究，写了《历代刑法考》《历代刑官考》《行刑之制考》《汉律摭遗》《明律日笺》《刑案汇览三编》《读律校勘记》等一系列研究性著作，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和文化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在此期间，沈家本主持修订法律馆大量招聘留学海外的法律人才，翻译了德、法、英、美、荷、日、意等国家法律和法学著作，数量之大、质量之高前所未有，尽可能地掌握了更多的国外法制情况，为修订法律积累了丰富的参考文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期间，沈家本在《删除律例内重法折》中提出废止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在《变通行刑旧制议》中，提出将“明刑”改为“隐刑”，变闹市公开处决死刑人犯为特定场所秘密执行；在《禁革买卖人口变通旧议》中，力主废除奴婢制度；提出取消旗人法律特权，提出旗人犯罪与汉人同罪；提出禁止刑讯逼供、审判独立和改良监狱……《大清律例》等法律中一系列不适用条款被删除，大量符合现代法治文明的法律改革意见被体现在新制定的《大清现行刑律》《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大清民律草案》《大清国籍条例》等数十部法律（草案）中。

在此期间，沈家本担任京师法律学堂（中国近代第一所全国性的法学教育学校）的管理事务大臣。沈家本还推动成立了全国性的法学学术团体——北京法学会，并出任首任会长，创刊《法学会杂志》，为近代中国法制建设培养了大批法律人才。

客观而言，囿于当时社会现实，沈家本提出的不少法律改革措施并没



有实现。沈家本虽然尽了一生的努力，但没有能在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实现真正的法制现代化。他所希望看到的那个法治文明的愿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真正起步。

时至今日，在沈家本故居序厅中还悬挂着1913年春沈家本临终前在病榻上的一首七言律诗《梦中作》：“可怜破碎旧山河，对此茫茫百感多。漫说沐猴为项羽，竞夸功狗是萧何。相如白璧能充否，范蠡黄金铸几何。处仲壮心还未已，铁如意击唾壶歌。”这首诗，是在当时国家政局混乱、时局动荡背景下而作。在这之前，沈家本这位中国近代法制史大家已决定退出政坛，退隐金井胡同，但仍对国家民族命运忧心不已，对法制迈向现代化大业无限期待。



吴玉章是我国杰出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新中国高等教育的开拓者。革命年代，他就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毛泽东评价他：“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吴玉章的一生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他的诗虽然不多，但是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是他“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的真实写照。

一贯地有益于革命

“不辞艰险出夔门，救国图强一片心；莫谓东方皆落后，亚洲崛起有黄人。”这首《东游述志》作于1903年的长江三峡。在认识到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吴玉章毅然离开四川，东渡日本。在留日期间，他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并加入同盟会。1905年革命家邹容在狱中牺牲，深受邹容革命思想影响的吴玉章后来写下《纪念邹容烈士》：“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剪刀除辫人称快，铁槛捐躯世不平。风雨巴山遗恨远，至今人念大将军。”这首诗深沉地表达了他对邹容的敬仰和痛惜之情。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吴玉章回到家乡荣县，建立了革命政权。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又赴法国留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1925年，吴玉章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投身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中，实现了从资产阶级革命家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吴玉章回忆：“我入党时已经四十七岁。我的前半生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进的。从我少年时代起，就为国家的忧患而痛苦，而焦虑，而奔走，企图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找出一条光明大道。但是，找了将近三十年，经过失败，胜利，再失败，直到十月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中国以后，我才找到了真理，踏上了一条正确光明的革命大道。”吴玉章曾在自己照片题写诗句“中原王气久消磨，四面军声逼楚歌；仗剑纵横摧虏骑，不教荆棘没铜驼”，抗战时期他写下“全民抗战过三秋，老将雄心报国仇。直捣黄龙君莫懈，福星高照古神州”，表达出献身革命的抱负和激情。吴玉章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奋斗历程，每一步都展现出他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坚定信念，“一贯地有益于革命”。

吴玉章的一生经历了许多磨难，但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他的革命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一贯地有益于青年

1960年，吴玉章以82岁高龄写下一首自励诗：“春蚕到死丝方尽，人至期颐亦不休。一息尚存须努力，留作青年好范畴。”这既是对自己一生的概括，也是对自己的激励，更是对“一贯地有益于青年”的自我要求。吴玉章关心青年、爱护青年，是青年的导师和引路人。正如1965年他在一首送给张鼎丞的诗中写道：“岁华虽变心不变，永做青年引路人。”作为一名学者兼师表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吴玉章对学习问题，特别是青年的学习特别重视。第一，重视理想教育。他寄语青年，青年人首先要树雄心、立大志；其次要度衡量力，决心为国家、人民作一个有用的人才；为此就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第二，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期间，他提倡教学要结合实际，认为学生一经毕业，即服务社会，故在学习中，宜多予各生以研究之机会，要求青年人做到有真才实学，拿得出本领，成为工作中高明的人，成为“内行”的专家。第三，坚持终身学习。他指出，我们革命工作的实际斗争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断学习新的东西，不断开辟新知识的道路。1927年，吴玉章初到莫斯科时，连一个俄文字母都不认识。尽管年过半百，他仍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学习，一年后就顺利通过了俄语听说读写的难关。无论在多么艰难的情况下，吴玉章都坚持学习，坚持著书立说，成为革命队伍中著名的学者。1958年他与董必武同游七星岩时写道：“人生七

吴玉章诗词中的『一贯』风范

□ 徐小侠 贾 猛

十古来稀，我今八十身犹健。意志坚强嗜欲少，热爱劳动可延年。”1959年9月，他还立下座右铭立志要活到老学到老：“并已八十，寡过未能。东隅已失，桑榆非晚……戒骄戒躁，毋怠毋荒。”他为青年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

“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绝不松劲。东风得势，时代更新。趁此时机，奋勇前进。”这是吴玉章1959年11月写下的另一首自励诗，勉励自己做有益的事，做有利于人民的事。他积极推行汉字简化和汉语拼音，普及教育和推广普通话，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影响深远。文字改革是一项有益于广大群众、有益于广大青年、有益于革命的一项重大事业，吴玉章把倡导文字改革作为一生致力的工作：“我已是八十岁的人了。我跟汉字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从我个人来说，汉字再难也不倒我。但是为了工农群众，为了少年儿童，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一定要改革汉字。”这样深厚的情怀，根植于对国家、对人民深切的热爱。在推广汉语拼音的实践中，吴玉章始终奋战在第一线，身体力行前往多个省市推动汉语拼音教学。正如他自己诗中所言：“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毕生不做新民事，枉在人间数十年。”80多岁的他曾亲自到幼儿园听孩子们读书，检验《汉语拼音方案》的效果，先后前往东北和山西考察，耐心询问农民们学习汉语拼音的情况。在他的努力下，《汉语拼音方案》在群众中逐步推行了起来。简化汉字给新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作为教育家，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吴玉章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革命干部和建设人才。为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年逾古稀的吴玉章又在党中央的重托下创办了中国人民大学，80多岁高龄时还坚持登上讲台给人大师生讲党史，真正践行了“一息尚存，绝不松劲”，真正做到了“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辈子做好事”。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赏析

